

供给如何引导和创造需求

张颢瀚 张明之

内容提要 供给与需求关系结构性失衡导致了现代社会化生产过程的不畅;供给与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反映;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于再生产的过程之中;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方面;投资是改善供给侧结构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 供给 需求 结构均衡 供给侧改革

张颢瀚,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教授 210004

张明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210003

一、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割裂了现代社会化生产过程

恩格斯在“天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述竞争时提出:“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尽管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1],但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和引导供求关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供求关系的力量对比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总量失衡到结构失衡的演变过程,而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带来的制度变革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未充分发展,物质和文化产品的供给还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卖方市场背后折射的是供求关系的总量失衡,即供给在总体上落后于需求。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大批量生产模式成为解决失衡的主要思路,依赖于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政策红利。随着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得到很大释放,社会总产出与总需求在统计意义上的数量距开始逐渐缩小,但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即供求关系的结构失衡。

供求关系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一是商品和服务供求结构失衡。马克思认为:“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1]从生活消费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出现了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无论是对商品的质量、款式、性能,还是对消费的样式、渠道、体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无法适应和把握这些变化及其趋势。从生产消费来看,由于最终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的不确定,会造成上下游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错位,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或服务并不总是能够在质量和规模上实现市场出清。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生产或服务环节出现了过剩,进而可能堆积成产能的过剩,既影响再生产的顺利展开,也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更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性。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引发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供求关系由价格机制调整,而价格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由价格机制引导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至少包含三层经济学意蕴:资源流动的内在动力是因供求关系变化而导致的不同产业部门、同一产业部门的不同环节获利能力的变化,即“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2],平均利润率下降后能否获得超额利润;资源流动是对即期价格显示的滞后反应,资源流入形成生产能力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因而单纯的价格机制作用的后果是强化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状态是长期资源配置的结果,其存量资本结构很难通过价格机制所直接作用的增量资本流动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三是就业结构失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关联,通常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的节奏,并且具有很强的粘滞性。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依赖的分工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业、更具有技术含量,诸多劳动岗位之间的变换会遇到较强的技术、熟练程度等限制,造成大量的普通劳动岗位出现就业竞争激烈的现象。尽管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和传统体制性壁垒的松动,为劳动力的跨区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但事实上,就业岗位与劳动者技能的结构性错位依然存在。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亦不可轻视。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尽管生产体制经历了从工厂制、福特制、丰田制到温特制的阶段性演进,但其基于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的内核并未发生变化。马克思认为,“协作中的集体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表现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3]。“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从而决定着产品的大量生产,”“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4]。并且,尽管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条件,诸如柔性生产、敏捷制造、虚拟联合、小批量定制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生产流程,但依然无法改变社会化大生产的主流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量的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普遍采用了以规模经济效益为代表的标准化大生产体制;另一方面,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离不开标准化大生产的基本元素,诸如产品标准、生产模块、接口等,在发达国家的很多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如汽车制造业、ICT产业,也是以标准化大生产为平台来展开的。现代企业即使发展到智能机器人组织生产的阶段,也无法剥离和抹杀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个人或人的集合是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者、消费者,也是生产能力进步的最终推动者。

多类别属性的需求结构、社会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人的消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57页。

费需求既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后的购买能力,也取决于社会进步后人的需求层次的提升程度,更取决于消费升级后最终产品与服务满足于个性化需求的程度。同理,各类生产要素在特定经济空间的集中,就存在一个类别、质量和数量上的供求关系结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依赖于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有序。

供求结构的失衡,会扭曲要素或商品的价格,发出错误的市场信号,阻碍商品的价值实现,从而割裂再生产过程,不仅会加重原先的供求结构失衡状态,而且会引发新的结构失衡。由此,无论是整体意义上供求关系,还是生产端要素配置的供求结构,抑或消费端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供求结构,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再生产过程,而产业利润率的变化、社会资源的流动、国家宏观政策的取向,均是平衡供求关系结构的重要力量。

二、供给引领需求与需求实现供给统一于再生产

供给与需求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互为条件,相互推动,共同作用和统一于再生产过程,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侧面。生产形成供给,消费形成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和消费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包括“直接的同一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1],当供给方与需求方在市场交易上完成了货币与商品的转移,即使供给与需求均来自全球,也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得以实现。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供给引领需求是一个双重的结构协调过程。从供给出发,企业希望生产的商品与服务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并在市场上顺利出售,但这一愿望并非总能顺利实现,尤其是供求双方、交易过程、交割交付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后,供求关系的矛盾更加突出。正如恩格斯所言:“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2]。供给引领需求的双重结构协调方式表现在,一方面,供求关系的矛盾是供给结构自我调整的动力。供给是生产能力的结果,商品与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种与质量等生产能力密切相关,供给对需求的引领,实际上是生产能力对需求的引领。现实的生产能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供给结构从而对社会需求产生一定的限制甚至抑制,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3]。因而供给是调节需求结构的重要力量,不合理的需求结构通常是由不合理的供给所造成的;释放需求依赖于供给自身的革命,即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供给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不仅在于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的变化,而且通过生产能力的转型升级来引导需求水平的升级。消费升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然而消费升级不仅依赖于人均均的增长和消费心理的变化,更取决于企业的供给结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的空前发展,我国消费者在境外大量采购和代购,从奶粉到电饭锅,从马桶盖到纸尿裤……消费者需求层次的提升,追求健康时尚、性能出众、价实质优的产品,但在国内市场并未找到理想的产品,这种跨境购买行为折射出来的是国内供给结构的缺陷,由消费升级倒逼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需求是对有效供给的确认与实现。马克思曾生动地揭示道:“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4]。可见,需求对供给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描述都不为过。消费者以自己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第1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的偏好和品牌选择性,每天都在影响着供给者,驱使优质产品的生产者改进商品性能、降低成本,无情淘汰那些跟不上时代的生产者。需求对供给的选择、确认与实现大体上也是一个双重的结构协调过程。从消费者(包括中间产品需求者)出发,希望在市场上找到满意的商品或服务,并乐意为之付费。但市场上存在数量庞大的独立决策的供给者,也存在同样数量庞大的消费终端,供给正好满足需求的状态几乎是奢望,因而供求的矛盾是常态。需求实现供给的双重的结构协调方式表现在,一方面,当消费需求无法在供给侧获得满足,消费者通常会抑制和减少需求,或延迟消费,或进行异地(国)消费,从而会进一步压缩本地(国)的供给水平,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进行。另一方面,当某种需求被唤醒和放大后,在羊群效应的推动下,可能引发特定商品供给相对不足,商品价格上涨甚至大幅度上涨,直至出现价格泡沫,例如2016年上半年以来部分城市房价大幅度攀升。商品价格上涨会给供给侧传递错误的需求信号,极易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错配,因此,在加快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求端的引导也不可偏废。

无论是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调整或自主性调整,还是需求对供给的选择、确认与实现,均体现出供给与需求的协调与均衡是再生产过程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供给与需求统一于再生产过程。

三、供给创造需求是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

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均证实,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是客观现象,供求总量和结构之间的动态均衡是经济健康运行的标志。供求结构的失衡是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因而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需要从供求结构入手。在景气度普遍不高的全球经济生活中,作为全球制成品的供给者,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以往备受关注的出口增长受阻,扩大内需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然而内需又受到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错位的双重挤压,始终无法取得理想的经济社会收益和政策红利。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以供给端的变革引发的需求结构调整的趋势已经出现:一是普遍采用以模块化为特征生产组织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强供给的灵活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跨国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需要更加灵敏,生产力被分散到各个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在产业门类和产品种类上的差异,能够全球低成本地整合资源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价值链上或同一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实行专业化分工,面对不同地域的消费者供给最合适的商品。二是强化资本—技术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基于“温特制”(即以英特尔的芯片为代表的硬件与以视窗操作系统为代表的软件相结合的生产体制)的生产体系强化供给端的引导作用,构建“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而消费者面对的常常是一组互补产品组成的系统产品,这些产品间能够通过一定的协议(界面、平台标准)联结,但对外形成较高的壁垒,例如苹果电子产品及操作系统,消费者一旦选择就会被“锁定”,被动地成为品牌忠诚者。当然,发达国家推行的供给端调整的做法是建立在其主导的商业规则、先进的科技能力与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并广泛热议。供给侧改革之所以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言:“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1]。需求对供给的价值实现是建立在商品或服务的现实生产能力基础上的,如果仅仅在需求端发力,就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不重要,只要扩大需求就可以消化。且不论需求是否轻易扩大,也不论需求的扩大是否恰好能对接供给的结构与规模,单单是供给侧沉淀的巨量低端生产能力就无法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换言之,单方面强调扩大内需是无法消除经济结构失衡的积弊的。不仅如此,低端需求的迅速扩张会增大落后产能的新的堆积,例如近些年政府大力推行的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去产能举措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再以文化产品供给为例,在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国人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呈现快餐化、娱乐化、崇洋化、符号化的倾向,这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因迷失和彷徨而未能展现其独特的内涵与魅力;另一方面则是我国文化产品的供给未能很好地满足消费需求,无论是文化产品自身还是供给的渠道、方式等等,更需要从供给侧着手进行改革。

供给侧结构调整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不仅适应和引领需求,其灵魂在于创造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绝非单纯从供给出发、以供给结构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生产能力为主导,而是基于消费升级等需求端的变化,挖掘出供给侧的积极因素。如先进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产品性能大幅度提升、时尚的外观设计所带来的产品价值的深度挖掘、人性化的服务模式所带来的产品消费附加值的大幅度增加、新奇的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消费体验的深度改观、强势的品牌文化所塑造的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等等。供给创造需求的意图,是基于对需求变化趋势的灵活反应而主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调整,进而改变需求端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消费潮流和消费模式,以期推动供求关系整体的结构性均衡。因此,需求端的扩大唯有与供给侧的调整结合起来,尤其是强化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才能逐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固疾。

四、供给创造需求的可行思路

供给创造需求,既要研究消费心理与需求变化的趋势,也要研究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商品生命周期变化的规律,更要研究资产配置结构和生产能力布局调整的方向与方式,还要研究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方式、新科技革命引发的供给方式的创新,更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

从生产适应需求到引导需求、创造需求,离不开观念革新和投资结构调整。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形成供给能力的主要来源,因而投资结构和力度、以及与投资相配套的产业政策是供给结构调整的关键。在加大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医疗、保障房等公共支出外,重点向形成新的供给能力上倾斜。

在当前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个性化、新异化,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无形损耗”^[1]使得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相应地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缩短,因此供给侧基于技术跨越式进步的产品创新是创造需求的关键因素。基于技术跨越式进步的产品创新颠覆了以往资本霸权对技术的雇用和支配关系,建立了以技术创新、品牌概念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技术主导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资本甘为新技术的产业化纽带和催化剂,技术进步的生态化、低能耗、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产品功能上的新颖设计和服务上的开放体验,契合了多样化、自助增值化的消费需求变化,企业甚至可以根据订单配置生产要素,在诸多领域出现了供求大体均衡或供略小于求的良性局面。因此,供给创新需求,绝非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的样板,单纯追求服务业的高占比,而是依赖于科技创新所推动的制造业高端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整合发展。

〔责任编辑:天 则〕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